

四川大学「211工程」项目

古文字研究丛书

中國文字起源研究

何靖◎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中國文字起源研究

何靖◎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字起源研究 /何靖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11. 7

ISBN 978-7-80752-828-9

I. ①中… II. ①何… III. ①汉字—字源—研究
IV. ①H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4095 号

中国文字起源研究

何 靖 著

责任编辑	段志洪 陈 礼
封面设计	张 科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 bsbook. 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36. 75
字 数	88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828-9
定 价	95. 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李圃先生序

何靖君在他的新著《中国文字起源研究》中对两个概念做了明确的界定，一个是把“中国文字”界定为“中国通行文字体系”，一个是把“中国文字起源”界定为“中国通行文字体系的起源”。这两个术语的界定恰恰突出了中国文字起源的两大因素，即语言因素与社会因素。

就语言因素来说，先有中国通行语言才有中国通行文字。这个中国通行语言就是后来的通行汉语，而表达通行汉语的自然就是通行汉字了。客观事实也正是如此，因为汉字是根生于汉语的。汉语的特点是，形式方面具有节律性，内容方面具有自足性。这种节律性与自足性是从汉语语素到词、词组、句子和句群各类语言结构单位都共同具有的自相似性，这就是，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相对相反，又相辅相成，从单音节语素（音义结合体）到句子内部各类结构单位，总是以其对称平衡原则共同承担着汉语的表达功能。由于汉语是单音节语素为主体的语言，因而就有条件要求针对单音节语素来设计它的“物化”表达形式，让一个单个块体字形与单音节语素（音义结合体）组成一个跨越时

空局限的能够独立使用的具象语言单位。

前面提到的具象语言单位就是我们常说的语素文字。语素文字的突出特点是，形与声、义三位一体。这个三位一体并不是平面相加的，而是受着汉字本体功能的严格制约的。这就是，单音节语素的物化过程与物化回归过程的完美统一。具体地说，一个汉字的生成必须经过第一个过程，即以单音节语素为出发点的“物化”过程（取象造字——成字造义，整个字形同时接受语素音的转嫁）；接着经过第二个过程，即以单音节语素为归着点的“物化回归过程”（以成字造义为桥梁，系联语素的核心义）。“物化”过程具有具象直观性，“物化回归”过程则具有抽象概括性，两者有着内在的辩证统一关系：有了字的形体，有了语素转嫁来的音，又有了字形之造义导引出的语素核心义，进而便囊括了该语素所有的派生义，最终实现汉字形与音、义的统一。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核心义与派生义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如太阳系中恒星太阳与环绕着太阳运转的各大行星之间的关系，它们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可以这样说，一个汉字就是一个太阳系，千千万万个汉字有如灿烂的星空。尤其是显性的“物化”与隐性的“物化回归”，把有声汉语转换成听觉与视觉同步的具象直观汉语，这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完美结合，是中华民族思辨智慧的结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万岁文字，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

前面所谈，主要集中在语言因素与汉字生成的关系方面，而要了解汉字的起源问题，就要探索直接促使汉字必须发生的社会因素。

生存与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而经世济民的经济又是

这个永恒主题的主旋律。何靖君的新著《中国文字起源研究》正是把握了这个主旋律，以社会发展观为指导，把“文字生成机制”理论作为统领全书的核心理论，从广度与深度的结合上考察了中国文字的起源，为学界奉献了一部难得的历史文化考古的创新之作。

作者十分重视中国文字起源与社会发展，尤其是与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明确强调了贸易的社会效应，将中国文字的生成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图画和符号、巫师文字、通行文字，并重点论证了通行文字体系的“通行”与“体系”和通行文字体系生成的社会条件。作者认为，由巫师文字发展为通行文字，也就是通行文字体系，要具备开展较大规模贸易的条件，包括相当发展程度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要有优越的地理条件，要能利用畜力和使用车辆之类的运载工具，要在同一时期有多个文明的并起，而由此开展的较大规模贸易，则是通行文字体系形成的原动力。作者的这一理论概括，恰恰揭示了直接促使中国通行文字体系必须发生的社会因素。

何靖君在中国文字起源研究中所提出的具有理论穿透力的中国文字生成机制原动力说，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理论上的创新，往往是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一把钥匙。

李圃于上海丽娃河畔

2009年10月

* 李圃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古文字诂林》编纂委员会主编。

孟世凯先生序

我与何靖教授相识已有二十余年。记得是1985年11月，四川大学八十周年校庆，我先去探亲之后回到川大。当年徐中舒师主编的《甲骨文字典》正在古文字研究室编纂。因我是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的主要编纂者之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合集》已经出版，因此我每次回到川大都要到古文字研究室去拜访，我们在此第一次见面，故我们既是老朋友也是四川大学之校友。此后他多次参加先秦史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在先秦史学会第八次年会上还当选为理事。我常说四川是自古出才子的地方，他虽是中文系出身，但自幼酷爱书法，上大学后又对古文字潜心钻研，调入四川大学古文字研究室参加编纂《甲骨文字典》，在徐中舒先生亲自教授下，练就一身研究古文字的硬功夫，不仅是甲骨文专家，也是研究古史的行家，又擅长书法、诗词，通于绘画。但我认为他更多的精力仍是用在甲骨文方面，其著述就不一一列举，从这本《中国文字起源研究》的撰写、出版，就能看出是非一日之寒。我认为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一、要对考古资料熟知。因几十年来伴随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文化遗存和出土

器物上发现许多刻划符号或图形，是文字的源头。二、要有甲骨文功底。能直接使用甲骨文资料，因为商代甲骨文是处于我国汉字承上启下的时段，否则很难说得清楚。他完全具备了这两方面的功力。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古代以华夏族为主体，融合众多其他民族组合成的民族。华夏族在先秦以后称为汉族，因汉王朝时期其他少数民族对汉朝人称为汉人，汉族即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因此，汉族的文字称为汉字，并以汉字代表中国文字。当然，严格意义的中国文字还包含少数民族的文字，古代少数民族中有自己文字的极少，只在本民族聚居区域内通行，有的伴随历史进程而失传，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仍然使用汉字。故汉字从历史上就称为中国文字，沿袭至现代。在研究中国文字中也有用“汉文字史”来表述，这是不含古代少数民族文字。中国文字起源研究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历史上的研究基本上是根据承传的传说资料，这些资料是众所熟知，大体可分为：一、结绳纪事。《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这里的“上古”注疏家们都认为是伏羲时代。二、八卦与书契。《系辞下》又有：“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三、沮诵、仓颉造书契。《世本·作》篇：“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黄帝之史官。”这些传说的人物是否就是“后世圣人”？是否实有其人？暂且不去考究，但反映出上古发展的基本阶段，从伏羲氏至黄帝时大约有两千多年。

历史上对中国文字起源研究在近代前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果，直到清朝光绪末年，在河南安阳县小屯村一带的“殷墟”出

土商王朝后半期的文字，即甲骨学上称的甲骨文之后，才进入一个研究的新起点。“殷墟”甲骨文，特别是帝乙、帝辛时期象形字减少形声字增多，说明已经是成熟的汉字。加之民国十七年（1928）对殷墟的考古发掘，标志中国科学考古学的诞生，此后在一些地方发现、发掘出先秦时代的遗存、遗物上的刻划符号或图形，促进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去探索汉字起源。王国维以“殷墟”甲骨卜辞中的先公先王与《史记·殷本纪》作对比研究后写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等论文，经过二者结合研究商代史之实践，于民国十四年（1925）提出以“地下之新材料”（当时主要是甲骨文和金文）印证“纸上之材料”（古文献）研究古史的“二重证据法”。这一研究法改变了历来的单纯考据法，为古史学界绝大多数学者认可并付诸实践，至今无论研究古史、古文字、考古学都自然运用这一方法。近年或说将考古资料分为有字、无字的“三重证据法”，也可在“二重证据法”框架中去实践。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探索中国文字起源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在用“二重证据法”，但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因众所周知情形，我国考古事业发展缓慢，考古资料未能及时公布，使研究者无法去进行全面、深入的探索。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有学者也试图利用有限的考古出土器物上的刻划符号、图形，结合古文献有关文字起源之记载去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但因考古资料的有限未见有突破性的进展。到二十世纪末全国不少的地方又发现大量的先秦时期文化遗存，其中有很多都是墓葬，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不少的遗物，在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墓葬中，出土不少的陶器和残陶片上有各种刻划符号或图形。这些符号或图形在不同的地方的陶器上有一些

形状相同或相似，说明古人在这方面有许多共同的理念，这些遗存、遗物的时间从距今七千年左右到四千年左右。四千年左右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说，相当于夏王朝建立前夕，这样对于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更多之佐证。有学者认为有的刻划符号可能就是夏代之文字，我认为从商王朝的甲骨文来看还为时过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吸收前人结合考古资料探索文字起源的成果，运用最新的考古资料作综合研究取得许多进展，但是总感不足，因未见到一本较全面的研究中国文字起源专著。即使是研究中国文字发展的专著，在考资料方面，有的不齐全，有的结合不紧，有的就事论事，分析也一般化。

《中国文字起源研究》共十二章，前有“引论”，附录为“中国历代的文字起源论”，插图 196 幅，约八十余万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写了一本《中国文字发展史》（台湾文津社，1996 年出版），在写第二章“汉文字起源的问题”时查阅了九十年代前能找到的著述，除一些用传世文献论述外，能运用考古资料结合古文字作综合分析的不算多，大概是为条件所限，征引的考古资料也只是一些典型例子。近十多年来我很关注文字起源的研究，却未见有类似本书这样之著述，而本书几乎运用了近几十年来的考古资料，但不是单纯的比对，而是构成很好有机的内在联系，是本书的特色之一。近年见有的著述将贾湖、双墩、陵阳河出土的刻划符号称为“早期文字”，认为这些就是文字的起源。本书作者则认为：“最早的文字与文字的起源严格说来并不是同一问题”，因此提出“文字生成机制，大致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图画和符号的出现；第二阶段，巫师文字形成；第三阶段，通行文字的形成”。这样的构思比不加区别者更清晰明确，

是本书特色之二。运用考古资料不仅是中原区域，对东北、西北、东南、华南、西南和台湾、香港地区都有详细论述，使读者对中国汉文字起源多元化有全面的了解，是本书特色之三。据我拜读过和研究中国文字起源之著作，本书是目前见到的研究文字起源最全面的一部。

我认为写学术论文或专著是有时代性的，不仅给当代读者看，还要给后代研究者留下学术遗产，一定要深入浅出让别人看得懂，否则就失去应有之意义。运用考古、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等这些专业性很强的的资料写论著，对业内人士来说问题不大，但对有志于研究这方面的青年学人，或对此有兴趣、关心这一问题的人来说则有一定的难度。我曾拜读过有的学术专著，可能是我的水平有限看不太懂，询之别人，回答：“恐怕连作者自己也不一定看懂。”拜读《中国文字起源研究》部分稿本后，我认为虽是研究文字起源的专著，也是一部先秦古文字发展史，又是一部先秦社会生活简史，因书中结合先秦时代每一发展阶段的社会生活，涉及狩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青铜铸造业、宗教、礼制和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全书史论结合自然，文从字顺，流畅易懂。凭着一个人的精力运用大量的考古资料和甲骨文、铜器铭文等古文字资料，写成这本对中国文字起源全面探索之巨著，我认为是对中国古文字学界、古史学界做了一件有功德之事。

孟世凯于北京

2009年9月4日

* 孟世凯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

国先秦史学会秘书长、常务副会长，为郭沫若主编之《甲骨文合集》的主要编纂者之一。

自序

用了整整九年的时间，拙著《中国文字起源研究》终于完稿。我自己关于中国文字起源的一系列想法，基本上在拙著中表达出来，脱稿之后，感到还有些未尽之意，需要在这里谈谈。

在我看来，古今中外有关文字起源的传说或理论都可以看做是文字起源的假说。毫无疑问，即使是学者的理论，都远不是解释文字起源的终极真理，但不管是传说还是学者的理论，都各有不同程度的合理性。这些传说和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圣人或神人造字说，符号演变说和生成机制说。

圣人或神人造字说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有文字的民族，大多有圣人或神人造字的传说。如美索不达米亚的神话传说，书写术是由智慧神恩基所传授；印度有梵王和佉卢造字的传说；中国的传说主要是以文字为仓颉所造，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也有造字者的传说。圣人或神人造字说在本质上是上古时期英雄崇拜的表现，是关于文字起源的原始的、粗犷的表达。这些传说虽然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但仍包含了一些合理的因素：这类传说表明，文字的产生，是与人有关的，因为圣人或神人的智慧和神

力，都是人类自身能力的折射；并且圣人或神人的原型，在远古时期，可能就是祭司、酋长一类的人物，因此圣人或神人造字说，实际上暗示了文字的产生与祭司、酋长一类人物有着密切联系。这类传说是在文字形成过程中就逐步形成了，并且在相当历史时期中，是人们对文字起源的唯一看法。

符号演变说主要是迄今为止学者提出的各种文字起源和文字演变的理论。当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象形文字被发现时，西方学者提出了文字起源于图画的说法，此后的论述，主要是讨论图画如何演变为抽象的符号，抽象的符号又如何演变为音节文字、音素文字等一系列问题。由于旧石器时代的抽象符号的大量发现，近年来西方学者又提出文字起源于抽象符号，于是文字起源于图画又成为过时的观点，但也有学者折中以上说法，认为抽象符号与图画都是文字的源头。我国学者提出，文字是由物件记事、符号记事和图画记事三种记事方法引导出来的，当表音字出现才标志着文字的正式开始。由此可见，符号演变说主要从符号的产生、演变的角度来探讨文字的起源和形成。中外学者提出的各种文字起源理论，大多不出这个范围，故我称之为符号演变说。符号演变说与圣人或神人造字说相较，显然更富于理性，更具有理论色彩。

但是，符号演变说仅仅讨论了符号的产生、演变的一些现象，在我看来，这只是表层现象，还未接触到文字生成深层的、内在的原因。因此，符号演变说虽能说明符号演变的现象，却未能解释符号之所以演变的内因，在文字起源的这个课题中，有许多问题是符号演变说所不能解释的。例如，我在本书引论中已谈到，在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奥瑞纳文化、索鲁特文化和马德林

文化的遗址里，都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绘画和刻划符号，而人类最早的文字体系却未在欧洲产生。在亚洲、美洲、非洲、澳洲的广大地区，都发现了史前的图画和刻绘符号，但文字体系都未在这些地区普遍产生。又如，图画和符号最初只是少数人的创作，却能发展为能在全社会范围内传递、交流信息的文字体系，这个过程又是怎样实现的？很明显，符号演变说是不能解释这些问题的。

有鉴于此，我试图提出新的理论来阐明文字生成的深层的、内在的原因，这就是我提出的生成机制说，这一说法已在本书引论中进行了阐述，本书对中国文字生成过程的探讨，就是按照这一理论进行的。

我的文字生成机制说，概括说来，是认为形成能在全社会通行的文字符号体系要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史前人类为了多种目的（记事、表达情感、审美需求、传递信息、施行巫术等）而创造了图画和符号；第二阶段，在一定发展程度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巫师文字出现，巫师文字主要用于人神交流；而不用用于人际交流；第三阶段，在一定发展程度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畜牧业和手工业也发展起来，能够利用畜力和运载工具，同时，在适当的地理条件下，在同一时期有多个文明的并起，在这多个文明之间能够展开较大规模的贸易。只有满足了这样的条件，才能促进用于人际交流的文字体系——即通行文字——的形成。我认为，较大规模的贸易，是通行文字形成的原动力，而通行文字的形成，是人类文字体系形成的最具根本意义的关键步骤。

人类最早的两个通行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能在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形成，就是由于这两个

地区具备了文字发展的第三阶段的诸多条件。而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旧石器时代虽然发现了大量的图形和符号，却不能发展为通行文字，就是由于这些地区还不具备文字发展第三阶段的诸多条件的缘故。

按照文字生成机制说，南美洲的玛雅文字只能是巫师文字，因为这种文字主要用于人神交流，而不用于人际交流。并且玛雅不具备文字发展第三阶段的诸多条件，故玛雅文字还未能发展为通行文字。南美洲的印加王朝，虽已建立了国家，却没有文字，这一现象也可以用文字生成机制说来解释，这主要是由于印加王朝不具备与多个文明进行较大规模贸易的条件缘故。

按照文字生成机制说，我们可以比较合理地阐明中国文字的形成。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贾湖文化、双墩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史前文明都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符号，一些学者认为这些符号已经是文字，而另外一些学者却不认为是文字。按照文字生成机制说，似可平息这些争论，可以认为，这些符号已经是文字，但处于巫师文字阶段，故都是巫师文字。这些史前文化还不具备进行较大规模贸易的条件，其符号主要是用于人神交流，还未能发展为通行文字。

学术界对夏代文字抱有很大期待。实际上，学术界所期待的夏代文字，不是上面所说史前文化的巫师文字，而是通行文字。但是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考古材料，夏代直到晚期才开始出现发展贸易的条件，当这样的条件出现后，夏王朝已被商王朝所取代，因此，在夏代还不大可能出现通行文字。事实上，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夏代文字符号只有数十个，与通行文字相距尚远，还处于巫师文字阶段。

而通行文字的形成，只能是在商代。因为直到商代才具备了文字发展第三阶段的诸多条件。商王朝取代夏王朝以后，很快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发展了畜牧业和手工业，并且由于畜力和运输工具的使用，其贸易迅速发展，从而促使通行文字形成。商王朝早期，还在积蓄各种因素和条件，直到商晚期，通行文字才得以形成。

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我在文字生成机制说中强调贸易的作用，而不是强调经济、政治的作用，这是由于经济的发展，酋邦或国家的建立，并不是通行文字形成的充分和必要条件。例如，印加王朝虽已建立国家，却没有文字。又如良渚文化，虽有学者认为已是酋邦，但其文字还在巫师文字阶段。一种史前文化，即使其经济已有较高的发展，但如果没有与发展程度较高的多个异质文化进行广泛交流，也不能促使通行文字的生成，中国的一些史前文化就是这样的例证。而异质文化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物资交换才能实现，这一点我在拙著中已反复说明，这就是我强调贸易才能促使通行文字形成的理由。

还应指出，我提出文字生成机制说，实际上也是尝试提出研究文字起源的一种新方法。文字起源，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字学问题，实际上还是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文献学、传播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问题。在对中国文字起源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运用了这些学科的材料和研究方法，我的体会是运用这些材料和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现行文字通常称作汉字，主要是从中原文字发展而来，而商文字则标志着中原文字的形成，与此同时，广大南方地区也出现了文字，但由于南方地区不具备文字发展的第三阶段的诸多条件，故其文字未能发展为通